

关于費孝通的 “重訪江村”的一些材料

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

1957年8月

571.6555

144.7

民族研究所

目 錄

費孝通关于重寫“中國農民生活”一書的交代……	(1)
費孝通关于在江苏視察时的活动的交代……	(2)
重訪江村 (費孝通) ……	(6)
重訪江村 其二 (費孝通) ……	(17)
透視“重訪江村” …… 周叔蓮 李孚同 張思鰲 ……	(24)

費孝通关于企圖重寫 “新中國農民生活”一書的交代

我今年4——5月到江苏吳江开弦弓進行農村調查的一个目的是想寫一本英文的“新中國農民生活”。

这个打算的發生是从西南回來后接到英國老脫來奇書店，1956年10月16日來信，署名是弗蘭克林。

信上說我在他書店出版的中國農民生活一書，已經近20年了，現在已不值得再版，所以建議我重寫一本新中國農民生活，他們愿意出版。（原信已交組織）

我动了心，原因有这些：前年美國的特佛基尔寫过文章攻击我，并且捏造謠言說共產黨不要我去繼續農村調查。我那时就想总要用事实答复他。（往來文件都交組織）去年新西蘭一位我的老同学來華訪問，他曾去这个村子里去訪問，我想我最好也有个机会再去調查一遍，接到英國書店这封信，我就有了这个念头。

3月在一次人民代表和政協委員座談毛主席講話時，我坐在胡繩同志旁邊，我寫了一張紙條，把這件事告訴他，請他問問中宣部，能不能幫助我做這件事。他把條子帶走。開宣傳工作會議時，他說可以由經濟研究所幫助我，並派幾個助理一起去。直接和狄超白同志接洽，這樣就決定了。

我曾請柳陸祺同志代我寫了一封信給書店。我在信中表示同意舊書不再版，可以考慮寫新書，給他們出版優先權，並要他們把舊書版稅算清，交給我國駐英代辦官鄉同志，我本來打算把這信寄官鄉同志轉去，後來一攔，這信沒有寫，所以給書店的信也沒有寄出。我又想到等書寫成了，再考慮那里出版，在英國出妥當不妥當，所以攔了起來。（柳的信稿也已交組織，和柳上次發言有出入，這本書和這個書店和所提“中國士紳”一書無涉。“中國士紳”一書是沒有得我同意在美國出版的。是兩回事。關於“中國士紳”一書經過和在報紙上公開答复的事，統戰部都有存案。）

本來打算還要繼續在調查，這個意見已向狄超白同志表示過，然後再決定怎樣寫總報告，和為對外宣傳的作品。在出版前是必然要經領導上審查的。現在這些材料如何處

理和調查是否繼續將由經濟研究所決定。檢查我在这件事上的思想，我已經自覺的有这几点应当批判：

（1）答复書店的信虽則沒有發出，但是我在出版問題上並沒有反复考慮，向領導上請示，我把我的意图托胡繩同志轉告中宣部，請求帮助，这是不好的。应当首先考慮要不要寫这类書，寫了如何出版。至于版稅处理問題也应当請示，而我自作主張，認為給書店拿去，不如寄回來，多一点外匯也好。

（2）更嚴重的問題，如果我不是站在人民立場上來寫对外宣傳作品，將为引起的后果一定是極坏的。現在既然認識到自己立場沒有站对，而是反人民的，可以推想如果按那个計劃做了，危害性是可以肯定的。

（3）在思想上，我还是想在國外發表作品，心里还想到英美帝國主义國家的讀者，在感情上沒有划清界限，那是極危險的。我不但是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而且还具有買办性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但在这件事上暴露出來，我自己反省，曾經向朋友們表示过，要在國際上取得一个學術地位，而心目中还是以英美为主。这和我对待旧社会科学的态度联系起來，更为清楚。我不但沒有重視社会科学的階級性，在资本主义國家要有學術地位就必须是为帝國主义服务的。我不断絕这个錯誤的念头，也就必然成为叛國的人。我对于赶上國際水平的看法，現在檢查起來是極錯誤的。社会科学的國際水平不是在资本主义國家，而是在社会主义國家。所以不學習馬列主义是談不起赶上國際水平的。如果不是从馬列主义的道路上學習提高，而想赶上國際水平那必然会走上相反的道路，就是政治上犯嚴重錯誤。

費孝通关于在江苏視察时的活动的交代

一、关于張致平蚕種場的事：

在民盟開工作會議時，三月下旬，我到吳景超家，遇見一位吳景超的愛人的朋友，姓張，我原不相識，她的愛人在協和醫院工作。這位張女士那天談到她有個姐姐在南京，為蚕種場合併的事很傷心，說到過北京農業部、工商聯要求暫緩合併，但是江蘇農林廳不同意。她有個八十多歲的老父親干了几十年蚕業，不敢告訴他，怕他傷心，我听了很同情，說我要去江蘇視察，可以把這事原委告訴我。

我当时說，我当人民代表就得管管閒事，我还没有替江苏人民办过事。我認为当人民代表的就应当受理人民和政府發生矛盾的事。

这位張女士过一天到和平宾馆和她的爱人一起来見我，我刚在开会。接了她的信，并没有長談，了解具体情况。

回家我寫了一信給管文蔚付省長。对这件事提出了意見，并且說政府要合併这个蚕种場理由不充分，不能說服我，希望到南京时談一談。口气是很强硬的。

到了南京管省長和顧廳長都約我談，而且已經处理了。我去訪問了張致平女士，这位張女士的姐姐，蚕种場的負責人。她很感謝我为她出了力量。

我这种态度反映了我对人民代表的錯誤看法，是站在反对政府的立場，向党提出抗議，并且借以取得那些具有落后思想的人的同情，自以为得到群众的好感，这是右派分子的作風和活动，和所謂‘包公’思想一致的。

二、調查农村

二月从西南回来，接到英國老脫來奇出版公司來信，說我旧作‘中國農民生活’一書不堪再版，希望我另寫一本新中國農民生活。打动了我的心。

在去年，新西蘭訪問代表团有个名叫 CEDDES 的是我在倫敦时的老同学，他一來就和我談，他們的学生都要知道我到查过的那个農村現在怎样了。他自己要去看。后来他去了。我那时就有意思再去調查一下那个農村，再寫一本書，英國出版公司來信，正合我的意思。

我請民族学院研究部柳曉楓替我寫一封复信。三点：（1）同意他們停版，（2）同意他們再寫，（3）把旧書版稅結算，託官鄉代办轉給我，我原想把这信先寄官鄉代办，但沒有時間寫这信，一直沒有寄出。來信与信稿都已交民族学院組織上。

在寫这信之前，我在人代会代表座談毛主席講話（在常委会會議室）遇見胡繩。我寫了个条子給他，告訴他这件事。他說回去商量。在开宣傳工作會議时，他告訴我可以找科学院經濟研究所狄超白所長派人幫助我。

我就利用去江苏視察机会進行了這項調查。又为了容易和農民接触，邀我姐姐費达生同去，她住了一个星期就去南京了。

檢查这件事，我主观上想向資本主义國家宣傳新中國農村，但是心理是存在着兩個思想：（1）是想通过这本书提高自己學術界的地位，在國際上出名。（2）如我在：

重訪江村中所說的，想从实地調查發現問題，使百家爭鳴从一般揭發矛盾發展到提出具体建議。現在明白，象我这样的右派分子，从資產階級立場來提出問題和建議，實質上是要更有力的反对党的政策。比如我提出恢复小型絲厂的問題，可以獲得鄉民的欢心，而事实上是一时做不通的，等于是農民面前挑撥他們和党的关系。其他各点將來再批判。

这次調查實質上是一种政治活动。

三、利用新觀察來擴大我的影响

我在出發前告訴新觀察編輯戈揚，我要去重訪江村，她就要我寫稿，并派了一个記者張鳳珠跟我去。她在我到达江村后几天，赶到鄉間，因語言困难，住了一星期后回苏州。我又要新觀察派攝影記者到鄉間拍照，新觀察同意，派張祖道到鄉間來，也住了几天，拍了象片。我在苏州住了有一个星期，寫了兩篇：“重訪江村”。

檢查起來，我想利用新觀察約稿的关系，开拓一个擴大我思想影响的園地，新觀察記者中有我的学生：黃沙、張祖道，都是清華大学社会系畢業的，还有蕭獲，是联大时的学生，黃、張常來我家，蕭本來打算跟我在云南采訪，但是沒有碰上，他自己進行工作，只在昆明一起住在宾馆里有十来天。

我这次回京之后，到过新觀察好几次。在新觀察听到許多关于学生鬧事的情况。北京大学那兩個学生訴苦的事就是从那里听來的。

戈揚还請儲安平和我在前門吃过一頓晚飯。（6月4日）在那天吃飯时，我曾向儲安平推荐一个苏州遇到的老朋友陈廉貞，到光明日报工作，儲沒有接口。陈是我在中学时認識的，現在是民盟盟員，工作不安心，在中学教書。我和他談了一次，說如果有机会介紹他当編輯。

在新觀察知道黃沙寫了一篇关于北大学生鬧事的報導，我10日到戈揚家吃飯时，他們正要抽出这篇文章，还要我补一篇，我說了“言者无罪，有錯必改”，戈揚的爱人搖頭說不大对，沒有寫，那天晚上，我就以此發言。

新觀察受到了我的影响，應該進行檢查。

四、在苏州召开民盟盟員座談会

4月20日左右初到苏州，盟市委召集市委和中学若干盟員座談一次，討論“早春天

气”，我提出过“早春前后”中的三个问题。并主张解除顾虑，参加鸣放。

5月20日左右从乡间回到苏州，盟市委要我做报告，我说要讲，只讲科学研究。他们要我讲百家争鸣，我没有同意，改开座谈会。一共三次，他们的目的是要我和盟员都见一次面。第一次在师范学院，我首先发言，讲到要解除顾虑，参加鸣放。不少人谈到过去运动里所受的委屈，而且针对盟的积极分子，我出来对市委秘书长（建设局长，姓名一时记不起）说，盟现在不整风，搞出矛盾来不好。有人对学校提意见，我加以鼓励，比如有人说，把历史学和中文系拆开，一个搬到了南京，不好。我说可以写文章批评。有人说航空学校搬了几次家，浪费了很多钱和时间。我也说可以批评。第二、三次在市委举行，每次分两组。大多是中学盟员，对评薪评级不满，对党员校长不满的意见很多。不少人表示怕报复，不敢提。我说，报复不能保证没有，但是要有点勇气，而且盟作为一个组织应当保护盟员不受报复。我鼓励他们向文汇报、光明日报争鸣投稿，我表示盟员中很多是中小学教师，过去盟只在大学里作工作是片面的，今后应当重视中小学的工作，希望他们自己争取发言权。我回到北京还向争鸣的编辑千家驹说，今后争鸣必须开辟让中小学教师说话的园地。我这两年一直是主张要开展中小学工作的，因为大多数盟员是中学教师。

我又主张，在开人代会和政协之前，盟应当先开座谈会，吸收大家的意见，由盟代表发言。这个意见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也提出过。我是这样提出的，互相监督不只是个人起作用，应当组织起作用。这一套想法和盟提出对政府措施的意见是一贯的。基本上是资产阶级在野党的作法。

苏州有个盟员上次选举时，误认为他是地主身分，没有给他选举权，我听了，很同情他，认为这是件大事，是人权问题，曾向统战部反映，要他们重视。

我这样做根本没有去问苏州党对整风运动的布置，在盟内开这样的座谈会是点了火。

在苏州，新观察记者访问一个黄姓地质学家，因为苏州报上发表消息说他是发现鞍钢的第一人。访问时遇到一个肃反中被斗的知识分子，为了要开煤矿被认为是反革命分子（姓名已忘记）他诉了苦，张凤珠向我讲了，我要张祖道（摄影记者）接见了，把他的材料记下我回北京转交了专家局。这个人的经过，我听了，印象很深，后来又听到北京大学的情况，思想上很同情这些人，6月6日会上提到了肃反问题。

五、在无锡召开民盟盟员座谈会

5月底从苏州到无锡，是为了我有个哥哥，费青在无锡养病，我要去看他，一到无锡盟市委来接我，叫我做报告。我答应开几个座谈会：一次是干部，二次是基层小组长，一次是中学和艺专的盟员负责同志，基层小组长会上他们传达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就是关于学校党委制问题）。我最后说了一些话，鼓励大家解除顾虑。在中学和艺专那次会上，艺专盟员反映迁校事，很多人反对迁西安，而且已经上了文汇报，他们已向文化部提出意见，并且抄送盟中央，要求支持，我表示回到北京向文化部反映。这样说法是鼓励了他们不正当的要求，起了点火作用，干部会上我表示发展要量力而行。我要地方组织支持争鸣，表示今后要重视中小学工作。

重 訪 江 村 費 孝 通

本文作者21年前曾訪問江蘇省吳江縣震澤區开弦弓村，著有“中國農民的生活”（又称“江村經濟”）一書，在英國出版。此次重到該村視察。看到这个村子21年來人民翻天覆地的变化，深为感动，并对当前農民生活進行了詳細調查，提出了進一步改善農民生活的办法。特此刊載，以响讀者。文共三篇，此为第一篇，其他兩篇也將在本刊陸續發表。

——編 者

我前天才离开开弦弓，在村里住了有20天。

开弦弓是一个農村的名称。这个村子是在苏州南边，吴江縣境內，靠太湖不远，可說是在水鄉深处，从附近的震澤鎮搖船進去，还要二个小时。

21年前我曾經去过这里一次，是1936年的夏天。那时我刚从广西回鄉，在瑞山里跌伤了，到家养病。我有个姊姊在开弦弓帮助農民办了一个合作絲厂。她約我到村里去住一个时候。我在村子里順便訪問了老鄉們的生活。后来寫成了一本“中國農民的生活”，也称“江村經濟”，在英國出版。

抗日战争时期，这个村子淪陷后，音信断絕。解放后，我虽則常常想去望望这里的鄉親們，但事与愿違，一直沒有去成。今年春天毛主席号召知識分子“下馬看花”，我

才下了个决心，到这个比较熟悉的農村去受教育，这样住下了20天。

新观察的編者一定要我報導一些关于这个農村的情况。我不好意思推托，但是提起筆來，却好久寫不下去；真是千头万緒，从何說起才好。擺擺21年來变化的情况罢，几天也擺不完。这21年是个多么不平凡的时代，变动太大了。每一个人的經歷都是一部歷史。講起淪陷时的痛苦使我眼發声啞；不說別的，我那本書里所附第一张照片上的那个女孩子，阿娜，就是一个被惡霸迫害自殺的实例。講起了解放前后的斗争，令人可歌可泣；协助我們調查的農業社監察主任周富林同志就是一个生动的典型，从一个貧雇農怎样母死父病說起，講到解放后怎样参加農民代表大会，躲开地主的毒手，一直到翻身，搞合作社。他足足為我們講了一天一晚。再說合作化运动的經過吧，从春助夏散的互助組起，講到去年高級社成立时，滿村爆竹的景象，都是一段一段令人难忘的故事。

我应当把这些寫下來，講給大家听。但是我这支筆不听使喚，白費了許多稿紙，还是傳達不好。从小沒有学文藝，辜負了这样可貴的題材。

那么我还能寫些什么呢？

如果一定要我寫，我只能向讀者汇报一些我在这20天里看到的一些農村里的問題。

一

不用說，这个村子和千万个其他的農村一样，这21年里發生了歷史上從來沒有过那么嚴重和巨大的变化，从人剝削人的社会变成了一个沒有剝削的社会。誰看不到这个变化，或是低估了这个变化的意义，那他一定是个瞎子。这个巨大的变化一定会帶來繁荣幸福的生活，受过这几年来现实教育的人，是絕不会有絲毫怀疑的。

在我們中國，現在已經不是選擇那条道路的問題了，而是怎样更順利的在这条大家已經選擇定了的道路上前進。問題这样提出來，就要求我們去觀察在这道路上还有什么障碍，和怎样消除这些障碍。只看見障碍而不看見道路是不对的，但是只看見道路而不注意障碍也是不好的。我下面將在这个前提下提出一些問題，所以得先交代这一筆。

二

我的姊姊，她是江苏省人民代表，陪同我一起下鄉。村子里30歲以上的人可以說全都認識她。

我們的船剛進村柵，兩岸已經傳开了我們到达的消息。許多許多老婆婆在岸上叫我姊姊的名字，和她打招呼。船一靠岸，都聚了攏來，攬着她的手說：“我們老是想念你，你怎么老是不來呀。你瞧，我已經老成这样了，你还是那样。”“不，你們也还是

那样！”真象姊妹們久別重逢。有些老年人也还记得我，笑着說：“你一个人來，我們不会認識了，你發福了。”鄉親們这样親切，使我們感動得眼睛發酸。

拉着手不肯放。說什麼好呢？問大家生活罷。“日子过得可好？”許多老婆婆搶着回答：“好是好了，就是粮食——”說到这里就有人插口了，“剛見面就講这个，改天再談吧。”接着問我們：“你們老先生可好？——”

許多孩子們向着我們擠，我突然覺得奇怪，在这时候，这些孩子怎么会在河边看熱鬧？今天怎么不上学？他們都冲着我笑，有的拉了个鬼臉說：“我們不上学，割羊草。”旁边一个老年人补充了一句：“那里有錢念書，吃飯要緊。”

虽則就是这几句話，我們被粮食兩字吸住了。坐定，老鄉們散后，我悄悄的問農業社的干部：“是不是粮食有問題？”他点点头：六百多戶的村子里有不少人家感到了粮食有点緊張。他接着說：“問題是可以解决的。”

如果我們走馬看花，沉不下气，一定会想这地方合作化出了問題了。幸虧我們住得長一些，算算賬，才体会到天下事原不是那么簡單的。要說清楚这里的情况，还得化一些筆墨。讓我从头談起吧。

三

農業社办得有沒有成績呢？

成績是不但应当肯定，而且可以說很大。

水稻單位面積產量：1936年每畝平均是350斤；合作化后，1956年达到了559斤，增產二百多斤。

農業總產值也有顯著增加：我們替这个社的第二大隊算了一筆賬，1936年折米二十五万九千多斤，而1956年达到了四十一万八千多斤，增產百分之六十一。

这样的增產是不是合作化帶來的呢？是的，分析一下增產原因，第一是擴大了复種面積。1936年这个村子可以說是不種春花的，而現在普遍的種了春花，我們在村里就看到他們種双季稻。第二，在水利上有了改進。这地方是水鄉，地面很低，水漲的时候，水面可以比田面高，过去有許多田，一碰到水漲，就排不出水，收成很低。合作化后有力量开了溝，又包了抽水机抽水，使得过去的坏田变成了良田。第三，肥料增加了。首先是由于开了溝，可以用船載了河泥运送到过去送不到的田里。基肥一般已沒有問題。又由于農業社的領導，積肥也比以前多了。其他的因素且不多举，只有这三条，从350斤提高到559斤已是完全可能的了。

農業顯著地增產是不是提高了農民的收入呢？那却是另一問題了。農民的收入來源如果只是農業，農業增了產，那就会提高收入；如果不然，收入來源不只是農業，還有許多副業，那就得看農副業的比例，和副業是否增產增值了。開弦弓原來是副業發達的農村。21年前我常听老鄉們說：這裡种田只圖個口糧，其他全靠副業，這次我們又比較細致的估計一下，農業收入在當時大約占百分之五十五左右。因此，這地方農業雖則增產了大約百分之六十，但還抵不過當時的全部副業收入。農民收入是否增加的關鍵就在副業了。

象開弦弓一類的農村，過去副業的比例比較高，有個基本道理，就是人多地少。每個人平均只有兩畝左右的耕地，以過去水稻350斤計算，所有耕地全部種水稻，每人也只有700斤。那時各項剝削重，至少打去四分之一，余下來做為一個人的食糧还是很勉強的。只是吃飽，生活還是不改，於是想出了許多活路，開展了副業。

在地少人多的農村里，這可能是一般的現象。以蘇州專區九個縣的情況說，平均每人才有一畝八分耕地。我看，要顯著地提高這類地區的農民收入，單純的從農業入手是決定不夠的。如果忽視了副業的多种經營，那就会發生嚴重的問題。

四

要進一步弄明白這裡的經濟情況，我想我們首先得求出一個21年來農副業總收入的比較。但是一進入副業收入的計算，碰到的困難卻不少。即以當前情況來說，凡是農業社經營的副業，還有賬可查；家庭經營的副業，已經不容易摸清。要對21年前的情況進行估計，不但項目多，而且變化大：產量、價格都不穩定，如果稍具成見，離開實情就可以很遠。但是，如果不求出這個比較，憑印象來說話，自己就沒有把握。在這20天里，我們可以說主要是在搞清楚這個問題。白天黑夜的找人談，聚集了一些老鄉，展開爭鳴。好幾個一同去協助我工作的年青朋友打算盤，搖計算機，開夜車，我們花去的燈油平均是每晚一斤。在我離開時，最後大家能接受的估計還沒有確定，我們留着人在繼續調查，但是大體上心中是有了個數：1936年，除去成本的農副業總收入是平均每人合谷八百斤左右；1956年，是八百五十斤出頭，有了五十斤左右的增加，如果只算農民的純收入，就是可以用來做消費的部分，這兩年度的差額還要縮小一些，大約只有三十斤左右的增加。

這個數目說明什麼呢？1936年在這個村子來說是個比較好的年份，接近過去曾經達到過的最高水平。淪陷後，這個村子的經濟每況愈下，直到解放之後，我們才扭轉了這

个趋势。在農村合作化过程中，赶出了过去这个水平。但是我們計算的是平均数，实际情况是不平衡的。过去的貧雇農翻了身，提高得快，早已远超过他們当时的水平。而过去的中農却相反，大多是沒有多大提高，有些甚至下降了。感觉到日子沒有过去好过的戶数也不在少数。（農戶分类計算，現在還沒有做完，所以我还說不出具体数字。）

为什么農業增產了百分之六十，而还是有人感觉到日子沒有21年前好过呢？

問題出在副業上。

五

这个水鄉原是个有名的生絲出產地。过去在国际上具有突出地位的“輯里絲”就出在这个地区。当21年前我到这个村子里去的时候，是家家戶戶养蚕，他們所產的蚕繭，基本上可以供給一个小型絲厂所需的原料。我們这次曾抽了農業社的一个大隊作比較細致的估計，当时132戶人家要养650張以上的蚕种，以出售鮮繭作价計算，每年可以得到9万6千斤稻米。但是1956年只养了一百三十多張种，由于蚕种單位卵量增加，集体經營后技術提高，每張种蚕產量加了一倍，繭价也提高了一些，但总收入却只有过去的百分之六十，合5万7千斤稻米。总的說來是減產了。

为什么減產呢？关键是在桑叶供应減少了。減少的原因有兩方面：一方面是本村的桑樹在淪陷期間因为敌人怕游击隊襲击，鏟去一部分，大水时又淹了一部分，留下的不少又是老了，沒有更新，而且过去几年沒有注意培养，肥料下得少。自給的桑叶比过去減少了。另一方面是过去太湖里的东山一帶和浙江的山地，專門植桑，把桑叶供給这个养蚕区，現在这些地方也都养蚕了，停止了供应。如果去年不是因为浙江的蚕出了毛病，这个村里買不到一批桑叶，有不少蚕，不到結繭就会倒掉，收入还不会有这个数字。

如果分析一下，这里問題就是一大堆。我們且不細說，只提出兩点：第一是为什么讓本村可以种桑的地閑掉呢？为什么不把桑地上的缺空补足呢？为什么不用新苗來代替老桑呢？答复是缺桑苗。我听说江苏省去年已开始注意这个問題，現在正在大力培植桑苗。但是桑苗的分配上是不是合理，調配是否及时，似乎还是問題。最近江苏省人代会上就有人提到去年无錫配到的多少万枝桑苗沒有栽种的情况，报纸上这个消息，曾引起了这个村里許多老年的惋惜和長嘆。

第二是產桑和养蚕过去存在过地区分工的情形。这种在一定区域内，按当地具体条件進行專門化的生產，是否合乎經濟原則，是值得研究的。现在的趋势却是，有飼料的

地方自己育蚕，各个農業社勢必在飼料上都須自給，那就使飼料缺乏，而有养蚕傳統的農業社閑空了許多有技術的劳动力，一时要轉業是困难的。打一筆总賬，是否值得確是問題。

單以这个村目前情况來看，如果不能供应桑苗，不能供应桑叶，要恢复过去养蚕的副業，一时还看不出路子。即使桑苗的問題解决了也要三年到五年才能見效，而桑地面積究竟有限，我們粗粗計算，增加現有產量的一倍还有可能，再要多就会和農業發生矛盾了。能增加一倍，在產值上可以达到过去的水平，但是有技術的劳动力还不能全部發揮作用。

六

上面所談到的只是养蚕，养的蚕結了繭把繭賣出去，可以告一段落。現在这个村里的農民也只做到这个段落为止。但是过去却不然，一直要繅了絲才出賣。原來是家家戶戶自己繅的，到21年前，由于制絲工業的發達，他們所出的土絲，在質量上落后了，价錢下降。如果賣繭，一般商人总是要殺价，農民又会吃虧。就在那个时候，江苏的蚕叶学校在農村里推广技術改革，我的姊姊参加这个工作，把机器繅絲輸入到農村，在这个村里帮助農民办了一个小型合作絲厂，提高了生絲的質量，使繅絲这一个生產过程还是留在農村里。这个絲厂在淪陷期間給敌人拆成了平地。

这件事在外边似乎是已經被人遺忘了，但是在村里，農民們却还是念念不忘。原因是很簡單的，因为村子里有一个小工厂，好处是太多了。單說这个小工厂里經常的工人就有八十多个，每个人的工資在每月十元左右。还有許多零星和臨時的工作，即是年老的妇女都可以参加。第二，这种小工業等于是一个開設在農村里的技術学校，不断地培养出技術工人來，当时向外輸送的就二十多个。他們工資較高，每人每年可以寄回家里一百多元。第三，这是一个合作絲厂，經營的办法是農民交繭，制了絲，算出成本，按供給原料和入股資金分紅。原是學校协助下建立的一个集体所有的合作事業。一方面消除了商人的剝削，另一方面農民得到了繅絲过程中的利益。这許多方面加起來，对農民收入的提高是很顯著的。

自从这小工厂被敌人拆平之后，在淪陷期間，許多熟練技工在鄉間，除了做做家务，还能生產什么呢？土絲沒有了市場，机器繅絲沒有了工厂。解放之后，苏州的絲厂开了工，在村里招去了有四十多个工人。但是还有六十多个有技術的妇女，沒有机会進厂。这四十多个工人大多是以以前培养出來的，但是村里沒有了这个小工厂，現在十七八歲的

女孩子就沒有學習技術的機會了。大家念念不忘这个小工厂是有理由的。

这里提出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有很重大的意义的，就是这一类在農村里，也就是在原料出產地，建立的小型輕工業工厂，在今后是不是还有出現的可能和必要？談起了这个问题，我也有一段心事。因为21年前我看到过这种小工厂对于提高農村經濟的好处，印象很深，所以在解放前我寫过不少文章，提倡所謂“鄉土工業”。也許由于我道理講的不清楚，又过分強調了这种小型輕工業在國民經濟里的地位，在思想改造时，曾被当做資產階級思想，狠狠地被批判过一陣。現在平心靜气的想來，我当时的想法不是沒有錯誤，錯誤是在輕視了重工業，这是应当批判的，但是所提出关于鄉村工業的問題，我依旧覺得值得研究，其中有些地方，我覺得很適合于我們中國的具体情况。最近听到了关于第二个五年計劃的說明，更打动了我的心。这次我重訪江村，我这段衷曲又涌上心头。在百家爭鳴的今天，我有了勇气，再度提出來，誠懇的要求領導上能注意這個問題。

在我們國內有許多輕工業，并不一定要集中到少数都市中去，才能提高技術的。以絲綢而論，我請教过不少專家，他們都承認，一定規模的小型工厂，可以制出品質很高的生絲，在經濟上打算，把加工業放到原料生產地，有着很多便宜。不但如此，这种小型工厂还是促進農村技術改革的动力，許多屑物都是最好的肥料，工農業在技術改進上都可以联系得起來。何況工業过分集中到城市里去，社会上已經出現了许多不易解決的問題，人口不必要的集中是有害无利的。当然，我從來就沒主張过把所有工業都分散到鄉村里去。但是我至今还愿意肯定有些加工工業是可以分散，而且分散了，經濟和技術上都有好处。絲厂只是一个例子。

我提出这个主張和当前的趋势是不合的。至少过去这几年，似乎有農業社只搞農業，所有加工性質的生產活动，都要交到其他系統的部門，集中到城鎮里去做。甚至象磨糠加工这样的事都不准在農業社里進行。在开弦弓我就看到有个磨谷机，很可以把磨糠加工成为养猪的飼料，但是鎮上的磨谷厂不准他們这样做，宁可讓村里大批磨糠当燃料燒掉。以蚕繭說，烘繭过程也要划归商業部門去做，結果实在不很妙。但是看來國家遭受損失事小，逾越清規却事大。我希望在農業社經營範圍这个基本問題上，是否可以放开來爭鳴一下，多从实际研究研究，農業和工業之間究竟怎样配合联系，才最有利于我們在这个人多地少的具体情况中發展社会主义經濟？如果領導部門覺得这种建議值得在實踐里試驗一下，在开弦弓恢复这个合作絲厂，我相信群众的積極性是一定很高，而且我也愿意鼓励我的姊姊和一些專家們一起來提出个具体方案的。

話說远了，关于这个问题，讓我另找机会申說吧。

七

再提一項在过去比較重要的副業，那就是利用船只在農閑期搞販運。

船只是水鄉人民所不能缺少的工具，這一帶農村都靠河建屋，河道就是大路。有些田地四面圍水象个小島，沒有船只就接近不了。

这个六百多戶人家的村子一共有大小船只一百六十条。这些船只除了做交通工具，在農業里的用处是霸河泥，但并不占很長的时间。在过去一到農閑，老鄉們就利用这些船只去販賣和運輸了。据說利用來做販運的船只有一百四十条左右。他們活动的範圍也很广，几乎包括整个太湖流域：东到上海、浦东，南到杭州，北到長江，西到宜兴、句容。这些老鄉对于这个流域水道摸熟了，而且会走捷徑，兩天可以搖到上海，速度也是驚人的。販運的貨物种类很多。因为这个地区各地有特產，比如崑山地区出產毛竹、杉木、硬柴和炭，靠海地区出產海蜇，靠太湖地区出產蔬菜，而且还有些地区出產特有的手工業品，比如竹器等等。他們就在这些地区之間互通有无。

这个經濟網絡看來由來已久，这个村上的老鄉和產地的老鄉具有傳統的关系，有了交情，因此他們可以从甲地除了貨，到乙地賣走了，再把現款回給甲地。一方面看來帶有信貸性質，另一方面，我看主要是利用船只來做運輸，当然其中也有些商業性質在內。通过这些船只活动，使各地区都能發展他們的特点。

限于船只，并不是每家都有机会参加这种活动，各人販運的日子也不一律，每次掙的錢也不一样。如果估計一下，每只船一年掙七百五十斤米是并不困难的。

農業社建立之后，販運活动全部停止了，因为这种活动被認為是資本主义性質。政府的運輸部門虽則也曾設法想利用農村里船只的運輸力量，但是農民对此并不積極，1956年参加運輸活动的只有10条船。

为什么運輸活动几乎全部停頓了呢？其他同类村子情况是否相同？对于这个地区的經濟影响怎样？这些问题牽涉的面較广，我們住在一个農村里无法全面了解。但是从農民收入这个角度看去，这些可以利用的船只閑空下來，并不很妙。我們不相信搞社会主义了就不能利用这些生產資料，应当是可以利用得更好，但是事实还不是这样。

八

我在上面已提到过孩子們养羊的事，这种家庭副業在21年前就有的。草原上的牧民听到了也許不会相信，象这样水道縱橫，阡陌棋布的水鄉里，怎能放羊呢？一个到这村

子“走馬看花”的人，也可能根本看不到這項副業，因為一眼望去，一只羊都沒有。但是過去全村却養有近千只羊。這些羊終年關在小棚里，並不需要自己找草吃，而是人們找到了草來喂它們的。

養羊的收入也不壞，一只羊可以賣10元，出的肥料值20元，還可以剪毛，自己紡了絨線結成毛衣。我就看見過不少老鄉穿着絨線衫。起初還以為他們學时髦，有點浪費，後來才知道是自給的手工業品。

從養羊這件事更可以看見這地方的農民對土地利用真是無微不至，寸草不留。這許多羊吃的草是由孩子們一棵一棵地割來的，在田旁、路上、水邊，孩子們三三兩兩的在割草。為了要割羊草，很多孩子學也不上了，這是下邊我還要談到的。

合作化過程中，過去許多不能種田的土地現在開成了良田，耕地面積擴大，長草的面積減少。提高了生產力卻難為了孩子。他們為了割羊草，要坐船外出，愈搖愈遠，時間耗費得也愈來愈多，而所得到的草却愈來愈少。羊的數目現在只有二百多只了。

不但如此，過去幾年里又發生了養兔這項副業。兔子也要吃草，羊兔之間產生了矛盾。而兔子卻占了優勢。原因是買小羊來喂，成本高，搭個羊棚更不是易事。一條羊如果沒有長成就瘟死了，賠本多風險大，小兔子只要几毛錢的成本，養二只兔子，連肉連皮毛連肥料，一起也有10元左右的出息。現在全村至少有一千多只兔子。

我小時候也養過兔子，那是養來玩的，到處打洞，滿地糞穢，搞得全家反對。想不到這里的兔子卻會乖乖地住在籠里，終年不出來散個步。沒有親眼看見，誰也不會相信，動物的習慣這樣容易改造！兔子的糞穢很值錢，農民積極積肥是個合作化后的新氣象。

我對於養羊養兔還是有意見的，它們為農民創造財富那是很好，但是搞得孩子們上不了學，花的成本似乎太大了。當然，如果我們能另辟飼料來源，情況也不同了，為了孩子上學，使我特別關心畜牧業的飼料。當然，如果飼料問題不解決，羊也好，兔也好，總是繁殖不多的。

過去這個村子很少養豬，平時吃的肉大多從外邊運進來。最近幾年才開始提倡，應當說是有成績的，現在已經有二百多只，每戶平均三分之一只。養豬的困難，除了這地方缺乏經驗外，主要也是飼料問題。豬比羊兔吃得要考究些，多少要些調味的米糠，這一項就很不够。我在上面已說到過，原本是有條件可以利用磨谷機把麩糠碾成細末，加上一點米糠，就能成為豬食的佳品，但是由於農業社和磨谷廠的矛盾，麩糠都當燃料燒了，我看見了真心痛。清規戒律之為害有如是也！去年農業社會為養豬戶留出飼料地，

但是这里的土地太珍贵，留下的地長出的东西不去喂猪，而给人自己吃了，猪当然爭不过人。結果今年連飼料地也收回去了。这也怪不得社員們沒有紀律。想在土地上打主意，看來是打不通的了。

飼养業的好处，不用我說，实在很大，且不說可以解决肉食供应的緊張，就是从进一步提高農業的產量來說，沒有猪，羊，兔这些动物的协助，困难就不小。我們一再和老鄉研究各項生產的潛力。首先是農業，不論副業多少重要，当前还得承認農業的老大哥地位。老鄉們一致的意見，从現在每畝五百多斤再要提高到六、七百斤是不應該說有很大困难的；但是缺少一个宝贝，那就是肥料。在肥料方面用河泥做基肥，这个地方的供应很充足，不發愁，所缺的是追肥。追肥的供应除了化学肥料工厂之外，就是要把动物看成自然的肥料工厂。而这种工厂都可以分散到鄉間去的，發展起來可以比重工業快得多，在这种肥料工厂里，猪是头等的。

要提高耕地單位面積產量到700斤，必須增加追肥供应。化学肥料一时还供应不上，就得养猪、羊、兔。要建立这些自然肥料工厂，就得解决飼料問題，这是当前开展副業的關鍵所在。

九

这个村子的副業还不只上面所講的那些，如果再要一項一項的講，文章会拖得太長了。但是重要的几項上面都已提到了。总的看來，副業方面現有的水平是沒有21年前高了。作一个大約的估計，1936年，副業占農副業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几，而1956年，却不到百分之二十。这里農業增產增值是一个原因，副業收入的下降也是一个原因。

副業收入下降的原因，正如我們上面所分析的，是很复杂的，但是那一条也不能算到合作化的賬上去，相反的農村合作化提供了發展副業的有利条件，問題是在过去領導農村工作的部門对于这种原來副業比例特別高的地区沒有很好貫徹对于多种經營的“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方針，这里存在着許多值得注意的内部矛盾。今后如果能更好地执行了这个方針，副業發展問題一定是能解决的。

十

以开弦弓这样的農村來說，副業既然是如此多种多样，相互間关系又如此复杂紛紜，應該抓什么？怎样抓呢？这是我想最后談談的問題。百家爭鳴不应当停于揭發矛盾，还应当講道理，出主意。主意不一定出得对头，但是这样試試是有益的。

开弦弓的鄉親們對我們这样親切，他們看見我們來了，抱着很大希望。如果我只寫